

## 三保之謎： 從鄭和下西洋看中國化宗教的包容主義

湛如

北京大學

**摘 要：**鄭和 (1371-1433) 是帝制中國時代一位橫空出世的人物。除了在人類航海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鄭和的宗教背景與宗教活動也豐富多彩，撲朔迷離，值得探索。通過對其宗教生活的一些重要面向的鉤稽，本文強調，雖然鄭和出生於伊斯蘭教家庭，但因為他所處社會和時代的多元性與包容性，鄭和被注入包括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其他若干宗教信仰的多重維度，不但映襯出鄭和個人的多元經歷與特殊觀念，更生動體現了中國化宗教的包容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傾向。

**關鍵詞：**鄭和、航海史、伊斯蘭教、包容主義、世界主義

## 一、引言

鄭和 (1371-1433) 是帝制中國時代的一個相當突兀的存在，這不僅因為他的大規模的遠洋航行似乎逸出了中華文明數千年來內陸文明的常軌，而且還在於他自身宗教身份複雜多樣，撲朔迷離，牽涉到了另外一些與中國古代文化相關聯的重要議題。鄭和的傳記見於《明史·鄭和傳》，其中記載其生平大略如下：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與同〕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鄭〕和等還，諸國使者隨〔鄭〕和朝見。〔鄭〕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差。……

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誘〔鄭〕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鄭〕和舟。〔鄭〕和覘賊大眾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官屬。劫〔鄭〕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是時，交趾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讐，來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復命〔鄭〕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剌。其前偽王子蘇幹刺者，方謀弑主自立，怒〔鄭〕和賜不及己，率兵邀擊官軍。〔鄭〕和力戰，追擒之喃渤利，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

十四年冬，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鄭〕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

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鄭〕和齎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

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鄭〕和、〔王〕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

〔鄭〕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鄭〕和亦老且死。自〔鄭〕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鄭〕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sup>1</sup>

《明史》中鄭和的本傳中所記載的主要是他出使西洋之事，對於他的個人生平則所記不多，更沒有多少涉及他的信仰世界。這既與正史的體例有關，也與其身份使之仍處在帝制時期知識精英的視野之外。

鄭和出生於雲南省昆陽州，原姓為馬。永樂三年(1405)，已任內官監的鄭和，請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1350?-1428)為其亡父撰寫《鄭和父故馬公哈只墓誌銘》。此方碑文對鄭和的家世背景有所交代。他祖父為拜顏，父名哈只(1345-1382)。哈只就是哈吉，為伊斯蘭教巡禮過聖地麥加之人方有的稱號。不少學者據此指出，鄭和出自穆斯林家庭，伊斯蘭教信仰來自天生。

<sup>1</sup>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766-7769頁。

作為一位中國古代帝制時期空前絕後的大航海家與外交家，鄭和的事蹟無論是放在封建時期的哪一個朝代都是非常突出，甚至驚世駭俗的。在二十八年的時間中，他先後七次遠航西洋，總航程達七萬多海里。其艦隊規模之巨大，航海路線之暢遠，都遠邁同時代世界上任何一隻遠洋艦隊。他的七次大規模航海活動，不僅踏遍整個東南亞與印度洋海域，還到過中東，甚至有可能直接到達過非洲東海岸。這種經歷與貢獻，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內陸國來說，顯得異常突出。

與稍後不久大航海時代到來時的財富掠奪與殘酷的殖民統治不同，鄭和在其長而廣的航海活動中，基本與沿路各國和平相處，這就極大地促進了當時東亞與南洋、中東地區的商貿交流、文化與社會交往，也促進了這些國家更為深入地瞭解中國，並讓中國也瞭解了其他國家的物產、文化與社會。<sup>2</sup> 通過鄭和規模龐大的艦隊，中國與南洋各國實現了規模巨大的海外貿易，據《西洋番國志》卷首一通宣德五年發給南京守備太監楊慶等人的敕書：

今命太監鄭和等往西洋忽魯謀斯等國公幹，大小船六十一隻，該關領原交南京入庫各衙門一應正錢糧並賞賜番王頭目人等彩幣等物，及原阿丹等六國進貢方物給賜價鈔、買到紵絲等件，並原下西洋官員買到瓷器、鐵

---

<sup>2</sup> 對此當然也有一些其他另類的解讀，像 Tansen Sen, “The Impact of Zheng He’s Expeditions on Indian Ocean Inter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9.3 (2016): 609-636; Tansen Sen, “Zheng He’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South Asia, 1405-1433,” *China and Asia* 1.2 (2019): 158-191. 這些研究往往將鄭和航海中打擊海盜等必要的武裝活動當成是對於其他國家的武力干涉。這就脫離了當時很多東南亞地域尚未形成完整國家組織，從而導致正常海上貿易嚴重受挫的情況。即使是在當代，馬六甲海峽依然是世界上海盜最為猖獗的區域之一。鄭和商隊擁有巨大的商業財富，因此擁有武裝護衛是自然之舉。沈氏的研究似乎求之過切、過深，反而與歷史的真實性與客觀性產生了隔閡。

鍋人情物件，及隨船合用軍火器、紙劄、油燭、柴炭並官內使年例酒油燭等物，敕至，爾等即照數放支，與太監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監洪保等，關領前去應用，不許稽緩。<sup>3</sup>

除此之外，明代宰輔楊士奇的《東里別集》卷一之中也提到永樂十九年停罷寶船之時的詔書：

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庫交收。……各處脩造往諸番船隻，悉皆停止。其各處採辦鐵梨木，祇照依洪武年間例採辦，餘悉停罷。但是買辦下番一應物件，並鑄造銅錢，買辦麝香、生銅、荒絲等物，除見買在官者，即於所在官司庫交收。若未起運者，悉皆停止。

各處買辦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等項，及一應物料、顏料，并蘇杭等處續造段疋抄，造紙劄，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及造諸品海味果子等項，悉皆停罷。<sup>4</sup>

上述材料都表明，下西洋之前要採購大量用於貿易的物品等，而且一般要提前數月準備。這些鄭和下西洋之前所採購的貨物，是東南亞土著非常喜愛的交易物品。鄭和隨從人員的記載，證實了這點。與鄭和一起三下西洋的通事馬歡（活躍於15世紀上半葉），

<sup>3</sup> 鞏珍著，向達整理《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5頁。

<sup>4</sup> 楊士奇《東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39冊，第584-585頁。

於景泰二年(1451)據其經歷撰成《瀛涯勝覽》一書。書內記載了他隨鄭和下西洋時，親身經歷的各國航道、風土民情、政治經濟、出產等。書中還記載：

番人殷富甚多，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瓷器，並麝香、花絹、紵絲、燒珠之類，則用銅錢貿易。國王常差頭目以船隻，將方物貢獻朝廷。<sup>5</sup>

可見鄭和寶船之中所攜帶的貨物，很多就是用來與當地“番人”進行貿易交換的。以鄭和艦隊的巨大體量，其帶動中國與沿線各國之間的貿易的程度，可以想見。在鄭和第四次下西洋以後，他已經直達波斯灣入口處的忽魯謨斯(Hormuz，今伊朗的米納布)<sup>6</sup>。第七次下西洋之時，在此地停留了整整82天。其原因也是因為忽魯謨斯“此處各番寶貨皆有”，並且列舉了此處的二十多種珍貴貨物商品。<sup>7</sup>也就是說，在此處長期停留，乃是因為與當地作長期的貿易。在南亞、西亞，所能交易到的珍寶包括乳香、沒藥、安息香、蘇合香、沉香、龍涎香等珍貴香料；貓睛石、紅寶石、大顆珍珠、高二尺以上的珊瑚樹；還有獅子、金錢豹、野犀牛、麒麟、駝鳥等各種珍禽異獸。

與一般民間貿易的小規模不同，鄭和下西洋乃是永樂與宣德年間的大事，一次下西洋的人數就有近三萬人。由於各次下西洋的人員本來不同，故七次下西洋所牽涉到的航海人員共達十多萬人。這還不算與其進行相關交易，以及造船準備等各方面的數百

<sup>5</sup> 馬歡著，萬明校注《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25-27頁。

<sup>6</sup> 對此地可參廉亞明(Ralph Kauz)、葡萄鬼(Rodrich Ptak)著，姚繼德譯《元明文獻中的忽魯謨斯》，西寧：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sup>7</sup> 馬歡著，萬明校注《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第97頁。

萬東南沿海民眾。考慮到當時中國全國的人口也不過五千萬左右，鄭和下西洋對整個帝國政經、軍事與外交活動的牽動，實在是既巨大，又久遠。<sup>8</sup>

鄭和下西洋極大地推動了明代與各國之間的貿易，並且給帝國帶來了大量的海外奇珍異寶，也給東南沿海地區的工業製成品提供了外銷的通道。這些航海貿易行為也同時以實際操作來豐富了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海知識，證明中國當時的科技，完全有能力在遠洋船隻設計與建造、航海導航、遠洋航行等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由於其官營性質，再加上封建帝制時代缺乏全球獲取資本與利益的動力，鄭和的航海活動在經貿上缺乏計畫性與持續性；在人類地理大發現上，比其稍後的西方航海者，鄭和相形見绌。從中可見，落後的社會制度往往會成為科學技術獲得突破的最大障礙。但是，這並不妨礙鄭和下西洋依然成為人類航海史上的一座巨大的豐碑，也無法否定它曾為全球的文化與物質文明交流、航海科技的進步，都貢獻重大。在很大意義上，鄭和的航海活動可以說是近現代全球化時代到來前，在中國清代最終閉關國門，落下孤立主義的重重帷幕之前，中華文明中全球主義吉光片羽般的一次閃耀。在此後，祇有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隆隆轟鳴下，這個古老的文明纔又一次膽戰心驚地打開大門。

## 二、鄭和的宗教歸屬：個案分析

鄭和作為一位近代、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航海家，卻有著非常複雜的宗教歸屬問題。前此已經提到，他出生於一個

---

<sup>8</sup> 對於鄭和下西洋的原因以及對過去研究的分析，可參周運中《鄭和下西洋新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7-30頁。

傳統的穆斯林家庭。在很多情況下，這也意味著他自然會成為一位穆斯林信仰者。尤其是按照現代人對於宗教歸屬的理解，即一個人不應同時兼信幾種宗教。因此，鄭和在很多人看來，就是一位自然的伊斯蘭教徒，並且也會對其他宗教非常排斥。

然而事情卻並未如此簡單。2015年3月19日紐約功富比拍賣行，拍賣了一件明代寫經，標為“佚名明朝《楷書佛經》，金粉瓷青雅色書皮三十九開冊”。此件後為中國收藏家劉益謙購得，藏於龍美術館。此經為經褶裝，半葉五行，行十六字。其中所抄錄者，為《般若心經》等十種。寫經最後的雲蓮紋牌上書有施主的發願文：

大明國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書寫金字《金剛經》《觀音經》《彌陀經》《摩利支天經》《天妃靈驗經》《心經》《楞嚴經》《大悲咒》《尊勝經》《百字神咒》，永遠看頌供養，皇圖永固，佛日增輝。凡奉命於四方，常叨恩於三寶，自他俱利，恩有均沾吉祥如意者。永樂十二年三月吉日謹題。<sup>9</sup>

鄭和發願寫經，此非首見。此前的2002年，浙江平湖對當地的一座報本塔進行修繕時，從塔心中發現了一卷以《妙法蓮華經》長卷為主體的，共七萬多字的明代經卷。在這個寫經的雲蓮紋牌上，同樣有發願文：

大明國奉佛信官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鑄造鍍金

<sup>9</sup> 章宏偉《永樂十二年鄭和發心書寫金字經》復原研究》，《學術研究》2016年第5期，第142-148頁；邵磊《鄭和永樂十二年泥金書經卷淺析》，《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6年第2期，第170-181頁。



舍利寶塔一座，永遠長生供養，所冀：見生之內，五福咸臻；他報之中，莊嚴福壽。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sup>10</sup>

除了寫經之外，鄭和還曾發心捐造了很多刊刻版佛經。目前所發現的數量相當多，其中就有永樂元年(1403)刊刻的《摩利支天經》。《摩利支天經》的題記為：“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盡矣。”而另外一部雲南圖書館收藏的《沙彌尼離戒文》，其中題記為：

大明國奉佛信官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謹發誠心施財命功，印造大藏尊經一藏，計六百三十五函，喜捨於雲南五華寺，永遠長生供養。以此殊勳，上祝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海晏河清，民康物阜。所冀：福吉祥凡奉命於四方，經涉海洋，常叨恩於三寶。自他俱利答報，四恩均資，三有法界，有情同緣種智者。

永樂十八年歲次庚子五月吉日，福吉祥謹題。<sup>11</sup>

最為重要的則是一種刻本《優婆塞戒經》卷七的題記：

大明國奉佛信官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鑄造鍍金舍利寶塔一座，永遠長生供養。所冀見生之內，五福咸臻，他報之中，莊嚴福壽。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意。

大明國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書寫《金剛經》

<sup>10</sup> 周永良主編《越地藏珍 浙江館藏文物大典 書法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46頁。

<sup>11</sup> 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週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史跡文物選》，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4頁。永樂十八年為公曆1420年。

《觀音經》《彌陀經》《摩利支天經》《天妃靈驗經》《心經》  
《楞嚴經》《大悲咒》《尊勝咒》《百字神咒》，永遠看誦  
供養。皇圖永固，佛日增輝。凡奉命于四方，常叨恩於  
三寶，自他俱利，恩有均霑，吉祥如意者。永樂十二年  
三月吉日謹題。

大明國奉佛信官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謹發誠心  
施財命功，印造大藏尊經一藏，計六百三十五函，喜捨  
于雲南五華寺，永遠長生供養……永樂十八年歲次庚子  
五月吉日福吉祥謹題。

大明國奉佛信官內官太監鄭和，法名速南吒釋，即  
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時，謝天地覆載，日月  
照臨，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聖恩，前往西洋等  
處公幹，率領官軍寶船，經由海洋，托賴佛天護持，往  
回有慶，經置無虞。常懷報答之心，於是施財，陸續印  
造大藏尊經，捨入名山，流通誦讀……今開陸續成造大  
藏尊經，計一十藏。

大明宣德四年(1429)，歲次己酉，三月十一日，發心  
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牛首山佛窟禪寺流通供養。

大明宣德五年(1430)，歲次庚戌，三月十一日，發  
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雞鳴禪寺流通供養。

大明宣德五年(1430)，歲次庚戌，三月十一日，發  
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北京皇后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歲次甲辰，十月十一日，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靜海禪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十八年(1420)，歲次庚子，五月吉日，發  
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鎮江金山禪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十三年(1415)，歲次乙未，三月十一日，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福建南山三峰塔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九年(1411)，歲次辛卯，仲冬吉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天界禪寺昆盧寶閣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八年(1410)，歲次庚寅，三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雲南五華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五年(1407)，歲次丁亥，三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靈谷禪寺流通供養。<sup>12</sup>

上面大量的實物證據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是確定無疑的：即，正如他自己所坦承的那樣，鄭和不但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也曾經對於佛教的寫經與刻經事業捐贈了大量的財力。而且，作為一位航海者，他信仰佛教也非常合理，因為就他所刊刻與書寫的經典來看，其中很多也都是據信可以佑其平安的咒語、密教與儀軌類經典。也就是說，他的宗教信仰行為，與他的實際願望之間存在相當和諧的關係。另外，還應該注意到，永樂朝佛教氛圍非常濃厚。永樂帝本人獲得皇位，其中重要的謀士功臣就是道衍（姚廣孝，1335-1418）。此人年幼出家，一直隨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出生入死，也極受朱棣的信任。正因如此，在燕王藩邸中，很多從龍班底都信仰佛教。作為起兵時的重要功臣之一，鄭和受菩薩戒就非常容易理解。他的這種行為，其實是當時明代上層政治的自然選擇之一；而他的家庭信仰，反而是一個皇室政治圈中的小眾信仰。

<sup>12</sup> 以上題記，可參鄧之誠《骨董瑣記》，“鄭和造大藏經條”，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第593頁。另外亦可參萬明《新發現〈鄭和寫經〉初考》，《安徽史學》，2017年第1期，第39-45頁。

鄭和宗教歸屬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即使從以上這些材料看來，他的佛教信仰完全沒有問題。但卻還是會有另外一些相關材料需要加以梳理，以便與上述材料獲得一種統一。

在宣德六年(1431)，鄭和、王景弘等出使西洋之人於福建省長樂區南山天妃行宮，豎立《天妃靈應之記》碑，據此碑記載：

皇明混一海宇……皇上……命[鄭]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自永樂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大小凡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

……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者，誠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賴天妃之神護佑之德也。神之靈固嘗著於昔時，而盛顯於當代。溟渤之間或遇風濤，既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為夷，雖在顛連亦保無虞。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掠者勦滅之。由是海道清寧，番人仰賴者，皆神之賜也。

……神之靈無往不在，若長樂南山之行宮，余由舟師累駐於斯，伺風開洋。乃於永樂十年奏建，以為官軍祈報之所，……又發心施財，鼎建三清寶殿一所於宮之左。雕粧聖像，粲然一新。鐘鼓供儀，靡不具備，僉謂如是，庶足以盡恭事天地神明之心。……[鄭]和等上荷聖君寵命之隆，下致遠夷敬信之厚，統舟師之衆，掌錢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敢不竭忠於國事，盡誠於神明乎！師旅之安寧，往迴之康濟者，烏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於石，併記諸番往迴之歲月，以貽永久焉！……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

副使太監李興、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張達、吳忠，都指揮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楊一初稽首請立石。<sup>13</sup>

這塊碑石為宣德六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所立，並且在碑中總結了前六次的經過。認為自己的成功一是取決於朝廷，二是因為天妃的保佑。正是這塊碑，使得很多人認為鄭和信仰的其實是道教。

據明代嚴從簡(1529-?)《殊域周咨錄》載，永樂七年的時候，鄭和曾經帶領船隊前往錫蘭(今斯里蘭卡)。到了之後，他帶著金銀供養器物、彩色綢緞與織金寶幡，去佈施當地的寺院。<sup>14</sup>但是到了1911年，卻在斯里蘭卡的港口城市伽勒(Galle)發現了一通古碑(Galle Trilingual Inscription)，上書漢、波斯(Perso-Arabic script)與泰米爾三種文字，記錄了鄭和分別向佛陀、真主安拉與毗濕奴(Viṣṇu)三位神祇祈願修福。此塊碑石目前保存在科隆坡的斯里蘭卡國家博物館(Colombo National Museum)。<sup>15</sup>在此，限於篇幅，不贅述這塊“三語石碑”的內容。簡而言之，這“三語碑”的內容基本相同，連佈施品都一樣，唯一不同的祇是所供養的神靈。也就是說，如果是從此三種宗教的角度出發，則可以得出鄭和既是佛教徒，又是伊斯蘭教徒，還是印度教徒的結論。而這個有意思的現象，就非常值得我們多費些筆墨來略作探討。

<sup>13</sup> 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42-43頁。

<sup>14</sup> 嚴從簡著、余思黎校《殊域周咨錄》卷九“錫蘭山”條，北京：中華書局，第312頁。

<sup>15</sup> 對此塊碑石的研究，可參Lorna Dewaraja, “Cheng Ho’s Visits to Sri Lanka and the Galle Trilingual Inscription in the National Museum in Colomb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Sri Lanka* 52 (2006): 59-74.

### 三、鄭和宗教包容主義與中國的文化性格

鄭和的信仰，從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發現是一個極有意思的話題。衆所周知，他確實是伊斯蘭教家庭：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鄭和父故馬公哈只墓誌銘》中就記載了他祖父與父親的穆斯林朝聖背景。而且由於在前現代時期，能夠前往中東朝聖並非是普通人家所能做到的。那麼，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曾前往中東朝聖過，這事實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家族在穆斯林社群中有很大的影響。其他的材料也確實表明他的家族甚至可以追溯到元代的官僚重臣。除此之外，在第五次下西洋之際，他也趁機向泉州穆斯林聖墓行香。在《泉州靈山回教先賢墓行香碑》中就記載了“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聖靈庇佑。鎮撫蒲和日立。”<sup>16</sup> 家族宗教信仰的強大力量，再加上這些他成長之後祭拜伊斯蘭教聖地的行為，如果放在今天都可以成為他是回教徒的重要證據。

然而，作為一位代表官方出航的將軍、航海艦隊的指揮者，他也同樣具有多重角色扮演。作為多達數萬人的龐大艦隊的領導者，他要顧及的是整個團隊的宗教信仰多樣化，他還要想到那些漫漫征程中所遇到的不同文化與宗教信仰，所有這些都會影響到他的宗教抉擇。因此，鄭和的宗教信仰可能就是他政治職務的一部分。作為明朝皇室核心決策層中的一員，鄭和無論私人信仰如何，在公共場合表達對於佛教的尊重與信受，至少是一個符合當時宗教主流的舉措。至於他私下的信仰如何，則可能已經退居一個未必特別重要的層面了。

---

<sup>16</sup> 余振貴、雷曉靜編《中國回族金石錄》，蘭州：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1頁。

更為重要的是，鄭和生活的世界，是一個比起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地區在宗教上都更加寬容、在文化上也更加多元的環境。中國古代社會與很多西方宗教社會，也與比如中東地區排他性顯著的宗教環境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允許各宗教信仰並存，在這個非常寬容且多樣的社會中，儒家、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都可以有自己獨立的發展空間。在不少時候很多宗教之間還會發生較為緊密的互動，也就此相互吸收有益的成份。這主要還是因為，帝制時代中國皇室一般少有特別強烈的宗教信仰。雖然會有官方推尊的儒家意識形態，但對於個人宗教信仰層面則並不干涉。而且作為個體，一個人同時信仰多種宗教也是很多人的常態。也就是說，鄭和可能在家庭層面繼承了伊斯蘭教，但在長期深受周邊皇室成員與大臣的影響下，他又在個人層面接受了佛教；而這也不意味著他要放棄過去的伊斯蘭教信仰。這至少在明代的背景之中不是一件必須發生的行為。因此，他就可能會同時接受了多種信仰，並在這些信仰之間努力找到了一種平衡。就實際而言，這種宗教的多元接受性在東亞文化，尤其是在包容性極強的中國文化中，並不罕見。

雖然有證據表明鄭和的船隊在東南亞曾經支持過當地的伊斯蘭教傳播，但正如前印尼駐中國大使阿·庫斯提亞所讚賞的，鄭和是以和平的方式來傳播伊斯蘭教，並且非常尊重印尼當地的風俗。鄭和有自己的信仰，但他並不企圖去侵擾有其他信仰之人，也未干涉強行要求其他信仰者信仰他所信仰的宗教，這就為後世的宗教徒樹立了一個和平主義的宗教信仰典範。<sup>17</sup> 所有這些，應該都是根源於那個時代強烈的包容主義，以及鄭和本人對這種包容

---

<sup>17</sup> 雲南鄭和研究會編《世界的鄭和：第二屆昆明鄭和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頁。

主義的服膺。

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和諧；與之相應，進入中國的宗教也往往會與家庭倫理密切相關，而不是強調去與其他宗教發生衝突以凸顯自身的宗教身份認同。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宗教間的矛盾，使得個體的宗教信仰不太具有現代宗教所有的那種強烈排他性。正是因此，當我們用現代人的宗教劃分去重新觀照鄭和的宗教時，就會出現那麼多用現代人的思維難以理解之處。這種時代上的思想落差，也恰恰體現了我們對於中國古代宗教理解上的狹隘與不寬容。

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即作為中國政府官方的代表，鄭和七下西洋的公共外交的角色非常明顯。而作為一個認為是“天下共主”的中華帝國的代表，鄭和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明王朝，自然也都希望能夠超越任何一種地域的宗教信仰，而使明帝國成為所有宗教徒和諧公處的共治之域。明王朝自身是一個在民族與宗教上都十分多元的大帝國。境內不但有數十個少數民族，而且也有本土與域外傳來的各種宗教。再加上明成祖也是一個曾經東征西討，無論是在陸地還是在海洋都雄視四海的皇帝，他很自然地會認為，在對外關係之上儘量平等地對待各種宗教也符合明代皇室的根本利益。

總體而言，雖然鄭和出生在伊斯蘭教家庭，但那樣一個崇尚並且容許多元宗教並存的社會背景造就了他個人宗教信仰極為複雜的維度。它個人可能同時真誠地擁有佛教、伊斯蘭教甚至其他若干宗教信仰。這種複雜性就不但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宗教多元性，也反映了鄭和個人的多元經歷與特殊觀念。



## 四、結語

中國古代航海文化相對不突出，主要是以內陸文化為主，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鄭和及其船隊這樣的存在，猶如橫空出世，讓我們現在數百年之後回看，依然不禁歎為觀止。除此之外，他的宗教身份也極具複雜性，但同時也具有代表性。對其研究，就可以彰顯中華文明的宗教包容性與世界性。鄭和早年出生在一個有威望的穆斯林家庭，父輩與祖父輩都曾朝聖過麥加。他穆斯林宗教的家庭背景，無容置疑。但事件的複雜性在於，他的宗教出現了一種在今天看起來異彩紛呈、縱橫交錯的多元存在。

無論從規模與航海里程上，鄭和的艦隊都是不可思議的偉績；即便是跳脫出航海史相對薄弱的中國古代歷史，而放眼人類前現代時期的整個航海史上，作為航海家的鄭和，也都是出類拔萃，彪炳史冊的。但其航海理念、理想與實踐，與其後輩的歐洲殖民航海家卻大相逕庭。後者以財富掠奪與暴力脅迫為手段，將不平等加在了那些他們所到之處的地方居民之上；而鄭和艦隊，無論是揚波洋海，還是交接土著居民，基本上做到了與沿路人民和平相處。鄭和船隊因此極大促進了當時東亞與南洋、中東地區的商貿交流、文化與社會交往。

鄭和規模龐大的艦隊，其中一項使命就是推動貿易活動。在下西洋之前，他們要採購大量的貿易物品，以此來交易東南亞與西亞的土特產。但與一般民間貿易的小規模不同，鄭和下西洋的規模極大，甚至有傾東南國力而為之的特點。

鄭和下西洋給明帝國帶來了大量的海外奇珍異寶，也給東南沿海地區的工業製成品提供了外銷的通道。它也豐富了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海知識，證明中國當時的科技，完全有能力在遠洋船隻設計與建造、航海導航、遠洋航行等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

鄭和的宗教歸屬問題卻極其複雜。他的家族有穆斯林信仰的傳統，但過去的一百年中，卻發現了大量他資助佛教的行為。並且在各類他自己留下來的題記上，也都明確地表明他是一位大乘的佛教信徒。這看起來非常合理，因為航海者旦夕禍福，朝不保夕，信仰佛教可以給他帶來精神慰藉。而且，他所在的永樂朝佛教氛圍非常濃厚。從皇帝到大臣中，從龍者大都信仰佛教。側身其間，鄭和自然受其薰習。

鄭和宗教歸屬問題的複雜性，則在於還有其他材料顯示他有另外的宗教信仰。這包括在宣德六年的一塊碑上，明確記載了他向道教的神靈祈福。而在斯里蘭卡的一通三語古碑，則顯示他曾經向佛教、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三位神靈祭拜。因此，關於鄭和的宗教信仰，就需要考慮到他宗教信仰的多層次問題。首先從家族背景來看，他可能從小就受到了伊斯蘭教的熏陶。但成長之後，作為官方代表，尤其是作為多達數萬人的龐大艦隊的領導者，他要顧及的是整個團隊的宗教信仰多樣化。因此在公共場合與私人場合，鄭和可能就有不同的信仰側面。

更重要的是，鄭和的時代，中國對宗教信仰非常寬容多元，與現在極具排他性的宗教信仰環境有別。中國古代常常允許各宗教信仰並存，宗教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就非常頻密且友善。因此，鄭和可能因家庭之故，曾信仰伊斯蘭教，但長期受周邊影響，又在個人層面接受了佛教。從而出現了一個人信仰兩種，甚至多種宗教的可能。因此，鄭和在東南亞雖曾支持過伊斯蘭教傳播，但他是以和平的方式來傳播伊斯蘭教。這也體現了中華文化強烈的包容主義色彩。

最後，作為中國官方的代表，鄭和下西洋的公共外交角色也非常明顯。中華帝國這一“天下共主”的代表之身份，也讓他需要對多種宗教信仰保持一種兼容並包的態度。